

中國話劇電影先驅

洪深

歷世編年紀

中國話劇之名
為洪深所命名

中國新文化新戲劇運動和
中國電影之創建者

洪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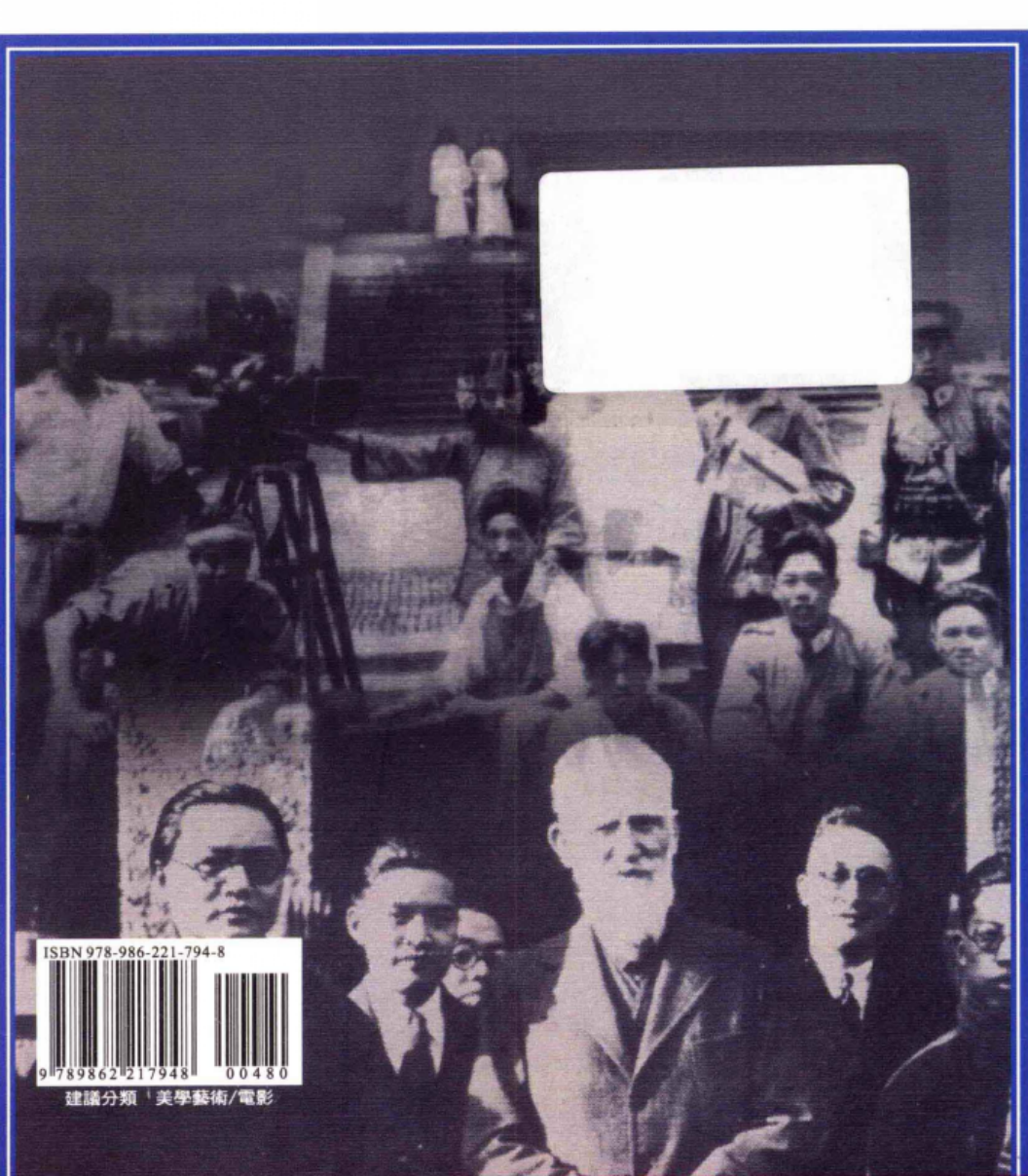
電影導演

李行

金鐘獎特別貢獻獎

崔小萍

摯推薦



ISBN 978-986-221-794-8



9 789862 217948 00480

建議分類：美學藝術/電影

這本書記錄了為中國新文化新戲劇運動和中國電影的創建，奉獻了一生的位中國的知識份子——洪深——的足跡。洪深歷經了清王朝、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不同政治朝代；洪深積極投身於八年中國的抗戰救亡；也親歷了社會的風雨動盪和社會天地般的變遷。從洪深個人的足跡，可以從中瞭解和認識中國近現代的知識份子，為了祖國的民主和自由的奮鬥，和他們為此的付出和艱辛，以及和他們付出完全不成比例的收穫。以望後人能從前人的足跡中有所感悟，能有更大收穫。

中國話劇電影先驅洪深

——歷世編年紀

作者 / 洪 鈐
策 劃 / 財團法人極忠文教基金會
責任編輯 / 蔡曉雯
圖文排版 / 蔡瑋中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8月BOD一版
定價：48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中國話劇電影先驅

洪深

歷世編年紀

洪鈐／著

敬獻給我的母親

常青真

(1914年12月—2010年3月)



洪深
(1894年12月—1955年8月)

目次

007 前言

015 上卷 清朝時期 ····· 1894 年—1911 年

033 中卷 中華民國時期 ····· 1912 年—1949 年

269 下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 1949 年—1955 年

301 附錄

302 洪深作品目錄

314 後續訊息

331 後記

336 台灣版跋

340 參考書目



前言

1955年8月，身患肺癌病危中的父親還能夠清楚說話時，對守護在旁的母親說：「我不想死，我還要活五十年，我要看到黃河水清的那一天！」表達了他強烈的求生願望。然而，沒有走出8月，父親就去世了。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對自己的人生旅途，可以做到完全真正掌握和控制。父親在世一生幾十年的生命歷程也如此。

父親家族，是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的大族。父親是清朝文學家、經學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孫。我的祖父（洪述祖）人很聰慧，未出洋但外文能力不弱，文才亦佳。祖父嚮往「仕途」之道，追求在官場發達：晚清時，祖父捐了個直隸候補道；民國建立後，1912年3月唐紹儀受袁世凱命組閣政府，祖父因與唐的交情而供職內務部，同年9月，趙秉鈞擔任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祖父很得其信任。1913年3月，宋教仁遭刺殺，祖父因此案牽連，於1919年4月遭極刑——死時很慘。祖父在軍閥混戰割據的政界供職，最終，他在強權齒輪的滾動中被碾得粉碎而消亡。這也是他咎由自取罷。

對於父親，祖父是生他、養他的父親，父親無法「回避」這個被社會視為「罪人」的父親。從1919年4月祖父被處死，到1955年8月父親去世，祖父的「死」讓父親一生都被這個「緊箍咒」般的枷鎖鉗制著。在祖父的「陰影」中，父親一生內心和精神受著煎熬。父親一生，是在痛苦和無奈中，承受著作為「罪人」兒子的現實。人生原本就有限的個人空間，也因此變得更小了，父親可做的人生選擇，受到很大牽制。

心無愧人不屈，父親只能挺起脊梁站立、前行；父親人生的路，走的異常艱難。父親用盡全力，在痛苦的煎熬中活這一世，很不容易。

父親為了實現自己必須遠離官場的目的，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毅然從工科轉學文科，學習戲劇。父親這個源於痛苦的無奈的轉向，不是消極的，他是認真嚴肅地選擇了「學習戲劇」。父親不僅相信他具有從事這種工作的天賦和能力；他更以為：戲劇也是一種「喚起民眾」的有意義的事業。

希望祖國成為民主和自由的國家，讓中國社會變成充滿光明的社會，是父親的理想，是父親一生的追求。父親為此奮鬥、貢獻一生。而且，父親潛意識中，要和民國「罪人」——我那「反動」爺爺——「劃清界限」的想

法，對父親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努力應該也是種促進。

父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閱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思想上開始有了新的認識。出於對中國和中國社會的理想和追求，父親開始了和左翼的接近：1930年，父親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劇團聯盟」，在文化工作中公開站在了左翼。當時，父親是在文化態度上站在了「左翼」，父親並不關注政治黨派間的鬥爭，他沒有、亦不願意參加政治鬥爭。

父親向左翼文化的逐步靠近，以至到他甘為左翼文化當名衝鋒陷陣的「排頭兵」，是父親人生追求在現實社會的自然發展。然而事實很殘酷：父親被「使用」，但並未曾被左翼真正信任和接受。儘管父親真誠地奉獻，父親實實在在地、而且是積極努力地實幹苦幹著，但仍然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1941年2月，發生了父親和母親一起「自戕」事情。後雖獲救，卻因此可以明白父親因為自己並不被「革命」所認可的那種痛心和絕望。

父親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個遠離官場的教書先生。父親自己的心願，是：「我自己呢，極願做成一位學者，但決不是所謂名流。」父親表示：「我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我今天的地位，都是我一個人的心血，汗珠，努力得來。」（洪深在病危與憤怒中：文藝新聞，1931年10月5日）

但是，父親兩次違背了自己初衷，接受了叫他做官的「召喚」——儘管兩次做的都是小官——中層幹部而已。對父親為「官」的現實，我曾經不解，更是難以「認同」。我一直懷疑：「如果父親不曾踏進『官場』，如果父親始終堅守在文化學者、大學教授的崗位，沒有和『官場』發生直接的關係，父親一生會不會是另一種生命狀態？！父親是不是就不會在他的壯年時候就離我們而去？！」

1937年夏，在中山大學任教的父親暑假時來到上海參加導演工作；當「八一三」戰事爆發後，父親沒有回廣州安排妻子和孩子，就從上海率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出發，走向了全民抗戰的戰場。1938年4月，第二次公開合作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了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的政治部。政治部下設的第三廳，由郭沫若任廳長，田漢是三廳六處少將銜處長。其時，父親帶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乙組）」正在湖北省襄樊進行

宣傳，當父親接到田漢要父親立即趕赴武漢的急電後，毫不遲疑地立即趕了過去，又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三廳六處戲劇科上校銜科長的職務。政治部三廳戲劇科，由當時在武漢的全國救亡戲劇宣傳隊伍整編成的十個抗敵演劇隊和一個《孩子劇團》組成，他們是當時國統區抗日戲劇宣傳的基本力量，父親是這支宣傳隊伍的重要組織者和主要管理者。父親沒有留守在安全的後方，他和演劇隊一起奔赴實地進行宣傳工作，是身體力行的積極的抗戰救亡宣傳工作者。

父親為了抗戰救亡宣傳工作，做了這個「戲劇官」。正如父親不無苦味地「自嘲」道：「為遠離『官』而搞戲，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則是為了『戲』而『做官』。」（戲劇官：洪深文集·4，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1945年秋，抗戰勝利。

1946年，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父親「因反對特務學生對進步同學壓迫脅持《谷風》壁報事件，每夜有持槍者包圍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幾近一個月，雖堅決挺持，而本人後腦神經系統發炎，兩耳失聰，均於此時加重。」

1947年，在上海江灣《復旦大學》，父親又因「1947年5月，上海學生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中本人支持進步學生，被反動分子持槍威脅、毆擊前後七、八次。」

1947年5月，上海全市學生進行反內戰反饑餓大遊行，並在校內舉行活動。在《復旦大學》教師和員工會上，父親建議全校教授罷教和向政府提出嚴正抗議；父親的建議得到與會教授認同。父親也因此為當局所不滿。

1948年春，沒有拿到《復旦大學》續聘聘書而「待業」的父親，接受《廈門大學》外文系聘任，帶著我們全家從上海到了廈門。同年年末，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了的父親，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以醫治牙齒為由從廈門隻身到了香港。1949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安排下，父親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蘇聯輪船到東北大連港。5月，父親到北京。9月，父親被共產黨安排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至此，父親最終是把中國的希望寄望於了共產黨，父親也因此把自己對國家的赤誠之心奉獻給了共產黨。這應該是父親必然的、也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吧！

母親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父親準備回到上海復旦大學繼續教書工作，但周恩來則要父親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親便在北京做了個「聯絡官」，直到去世。

父親「官」任的「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是個純粹事物管理性質的行政機關。1949年「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首任局長，是著名詩人蕭三。蕭三是老資格共產黨人，亦是毛澤東的大同鄉。讓父親做蕭三的副手，該局實際具體的事物性的事情，是要父親來做。父親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甚至連個民主黨派也不屬的「政治身份」，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難」。父親清楚，自己是屬於「舊時代」的人，是個要徹底改造的「舊知識份子」。因此，父親把自己工作的鬱悶和痛苦，都隱忍於心，不敢流露出來。精神和身體承受的重壓，讓父親不堪重負。

1949年10月之後，父親在那個「官」位上誠惶誠恐地做著事，他沒有了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適宜條件。其實，父親除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外，現實社會的種種，也讓父親明白：自己在文學藝術創作上，恐怕也是「力不從心」了，儘管他心仍有所不甘。

不過，父親也不是完全置身於文學藝術事物之外。例如，1953年，郭沫若先生創作的話劇《屈原》由領導組織進行集體修改，父親被指定參加此項劇本修改工作，對此，父親態度認真，做事小心翼翼。

1930年，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面對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奮起揮臂、高呼抗議的父親；1937年，在「廬山教授座談會」上堅決要求國民政府抗日的父親；1938年，在武漢當面斥問汪精衛為什麼不抗日的父親；不再有了。

我對父親「不做官」的「食言」，已「釋然」。父親自己又何嘗不明白，他曾表示：「七年來最大的打擊，乃當日我為抗戰做官，遂以為所有其他的人亦必如此；而逐漸發現，事實殊不盡然；我不能不自笑『天真』。」（戲劇官：洪深文集·4，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遺憾的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難免會要遇到某種「身不由己」的無奈，而在面對這種無奈時，我們有時候真的很無力。

一個人生命的長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幾乎毫無區別。正如父親所說：「人總是要過去的，而事業——對人類的貢獻——是永生的。」而父親的努力：「我覺得我對於戲劇，研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對於後人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我研究所得寫出來，庶及以後從事戲劇的人，不必像我這樣吃苦費力。」也是父親的貢獻。我願意相信：父親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使對於後來的人，也仍然是有益的。

在苦味人生路途上，父親忠誠自己所選定的目標，勇敢、誠實地走著自己人生路，一直堅持走到了底。父親對待人生積極進取的勇敢態度，父親在人生路上一步一步向前進的人生實踐，應該也是中國那個時代覺醒的、有良知的、追求國家民主自由和社會平等光明的知識份子走的路。

我心中：父親可敬，父親可愛。

歷史在時間流淌中悠悠長長，隨著時間流逝，隨著父親越來越遠去，關於父親的文字，恐怕是很難會有什麼實實在在地記述了，即使還有什麼，恐怕也是在這悠悠長長之中而遭功利化——被演義、被異化、被文藝商業化——甚至被「醜化」。

每個人有權利寫自己要寫的，每個人有權利按照自己的觀點去寫。自己作為一個讀者，閱讀他人所寫，是了解，是受啟發，是參考，也是學習；對撰寫者必要尊重的同時，對於所書與自己的「相悖」之處，我持保留態度。

現在，我為父親編這本書，因為我和父親血脈相通，我有義務和責任、更有感情去努力讓人們——現在的人和後來的人——哪怕是不多的人知道：中國社會曾經確確實實的出現過、存在過怎樣一些中國知識份子，他們受到啟蒙後，是那樣真誠地為了國家民主自由，為了社會平等光明而獻身；他們身體力行地終生為此而努力。雖然，他們不斷地被中國社會的動盪風雨而吞沒，但那些活著的、始終頑強地堅守著信念的人，仍然勇敢地繼續奮鬥和努力。中國這樣的知識份子，也許不多——然而，他們從前是，以後也仍然是中國幾千年泱泱大國的脊梁和靈魂。

在我們中國，曾經出現了、曾經有過一些文化人，他們對民族和對祖國傾注了深愛，滿懷著為國為民的使命感，充滿激情地、忠誠地、身體力行地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和他們能夠採用的適宜方式，乃至不惜獻身——他們的愛國和政治家高呼的「愛國」本質不同——父親即是他們中的一員，是這個隊伍裏普通的、卻也是自豪的一名小兵。父親在自己生活的那個時代環境下，有著明確的努力追求的事業，獻出了屬於他的一切。父親算不上是什麼大人物，但卻並非一事無成。

就是這樣的一些愛國者、有良知、肯擔當的知識份子，為中國的民主和富強，用自己一生的堅持追求和努力實踐——不論艱辛和風雨雷電——始終堅持不放棄。他們，應該被自己國家民眾了解和認識；他們，應該得到必要的尊重。

「過去」，是實際發生過的一種集體的經歷，是確實存在了的一種集體的經驗。了解和關心「過去」，應該是對這種集體經歷和這種集體經驗的一種尊重。如果我們把歷史看作是，讓活著的人知道：「還會重複發生的是什麼。」那麼，已經發生過的、已經消失了的，就仍然還有意義。

相隔了一段時空、相距了一段距離後，再回過頭去看那些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曾經出現過的狀況，和生存在那個時候的人時，應該可以有更平和的態度，應該可以用更客觀理性的眼光，去回顧「過去」，去研究「過去」。

我做這件事，有難度——1955年，父親要求兩個女兒：「（你們）寧可當個二流的科學家，也絕不要做個一流的文學家。」父親態度的堅決，我此生不忘。雖然我連「二流科學家」也不是，不過一個「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而已——我需要從頭學起，我願意努力從頭學習。我可以做到，我更應該必須做到。

我的感情、我的思念、我的責任，三十年來無時不在提醒我、催促我，一定要去做這件我應該做、必須要做的事；三十年的學習，三十年的思考，三十年的積累，我會最大努力地去完成、做好這件事。

我用誠實的態度——良心誠實，做事誠實，表達誠實，對讀者誠實——

編這本書。惟這樣，我才具備編這本書的起碼良知；惟這樣，我才是父親真正的女兒。

我踏踏實實地搜集資料；我認真謹慎地閱讀資料；我充滿激情卻又嚴肅地來編輯資料。我用我的思想、我的認識、我的視角、我的所知、還有我的最真摯的情感，為父親編這本書，一本用資料記錄了父親一生歷經世事、步步行走足跡——做過的事，說過的話，和生存的狀態——的書。如果讀者不僅知道了，而且還願意去了解曾經在世的洪深這個人，那將是我所有努力、堅持、辛苦得到的最好獎賞。

我為父親編的這本「編年紀」，是關於父親一生經歷世事生活的資料性記錄。我是用父親本人（即事主）、以及存在過的社會時代和出現過的社會人，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記述、評論等，作為基礎而成的。我希望用事實——確實發生過、存在過的事實、確實說過的話、確實公開發表過的文字——來留下一個盡量更接近真實的父親，來反映那一個時代的存在。

在這種資料彙編的編輯中，任何主觀色彩的「說明」，是不適宜的，是多餘的。遵循這個想法，我在文字資料的前和後，不使用主觀褒貶的「定語」——左或右，高或低，是或非，好或壞，對或錯，革命或反動，進步或落後——以突顯文字資料原有的自然性。

書中的《時代背景》和《有影響事件》條目，簡略地採用了可能對事主有關或有影響的背景和內容，以有助於對本書所記錄的其時、其事、其人、其話的理解和體會。

在中國大陸地區，1993年出版了《洪深年譜》（約十一萬字）；2009年出版了《洪深年譜長編》（約十八萬字）。作為所書譜主的女兒，我感謝書作者付出的努力和辛勞。

我有自信：為父親編的這本書，值得編，應該編；這本書為讀者真實全面的認識洪深和了解他所在的時代，一定有幫助。

敬請讀者關注！敬請讀者批評！

2010年5月16日 上海